

新的亲信的政治力量

万岁通天二年(697),太平公主把“年少、美姿容、善音律”的中山义丰(今河北安国)人张昌宗荐给武则天(见图,画像),张昌宗又把他的哥哥张易之也拉进宫里。二张入宫后,深得武则天宠幸,连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一班贵戚重臣都“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郎是当时门生家奴对其主的称呼,可见一般朝官对二张畏惧之甚。

圣历二年正月(即698年12月),武则天为张易之置控鹤监,以张昌宗、吉项、田归道、李迥秀、薛稷等为控鹤监内供奉。同时,武则天又命张昌宗和李峤为修书使,召修《三教珠英》。控鹤监在久视元年(700)改名奉宸府,张易之依前为奉宸令。设置这个机构是为安置幸臣,召修《三教珠英》则有掩饰荒淫生活的目的。但是,控鹤监“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修书又“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可知武则天采取这两项措施另有用意。

三十年前,她就曾以修撰为名,把刘洎之、元万顷等一批文学之士召入禁中,让他们参决政事,“以分宰相之权”。现在的做法和过去类似,是想以二

武则天暮年的情感是非

·胡戟·

张为核心再召集起一批文士,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力量。

两次群起而攻之

二张得势,引起与朝臣争权的矛盾。他俩经常打击不顺从自己的大臣乃至王公贵戚,弄得关系十分紧张。

官员们愤愤不平,二张不仅夺走了许多权力,还使人感到当年滥刑下的厄运似乎又临头了。在五王政变前的半年内,反二张派的朝臣们曾两次群起而攻之。

第一次是张氏兄弟的贪赃案。张易之兄弟五人,生活糜烂,处事霸道。长安四年(704)七月,他们贪赃不法的事败露,兄弟五人一齐下狱。御史大夫李承嘉和中丞桓彦范奏张昌宗应免官,武则天却用杨再思说,借口张昌宗合药有功,将他赦免,并令复职。宰相韦安石又举奏张易之等罪,武则天只好对付韦安石、唐休璟再行鞠问。可是她马上又变了卦,在八月里把韦、唐二相放为外官,草草了结这桩公案。

第二次是当年十二月张昌宗引术士占相被告发的案件。



张昌宗下狱后,御史中丞宋璟和封全祜、李邕、桓彦范、崔玄暉、崔昇等以张昌宗“图天分,是为逆臣”,坚持问罪。武则天还想使用对付韦安石、唐休璟的办法,三次下敕要宋璟赴外差,宋璟以“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为理由不走。武则天不得已,只好责令对昌宗审讯议罪,但最后还是“遣中使召昌宗特赦之”。

可是武则天在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维护二张,为他们杀孙子(太子的长子)、孙女、孙女婿,贬走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等多年重用的大臣,将部分政务交给这两个秽声载道的家伙,四次命令鞫二张之后又四次下敕赦免,在二张一再被人告为谋反,也不怕树敌,不怕引火烧身,死死维护二张。显

然,仅以二张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的男宠是解释不清的。答案只能从政治方面去找,武则天需要一支亲信可靠的力量作为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

她终究自食其果

最初在废王立武之争时期,武则天靠的是许敬宗、李义府一伙,可是他们在7世纪70年代就或死或杀,被淘汰了。

以后,武则天依靠过北门学士和废中宗时用的裴炎那批人。可是他们有的老死了,其余几乎都被武则天消灭了。

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宰相大臣们或因专权用事,或因被罗织,有的被杀,有的被贬,变迁频仍,武则天手下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核心。自己本家诸武,本来是可以信赖的,但武承嗣等大闹争当太子的事非常不得人心。武则天找来找去,找到二张头上。二张是靠得住的,他们出身平平,除了有一个在永徽初年做过宰相的族祖张行成,再没有可以挂齿的政治背景。

为什么武则天不能再从朝臣中选拔一批人,像过去提拔

许敬宗、李义府及北门学士时那样做呢?武则天的统治代表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有利于新兴普通地主的发展,是有相当的阶级基础的,但为什么这时她不能从普通地主及在政治上转向拥护武则天的出身于旧门阀的官僚中组织起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呢?这是武则天过去十几年中实行了滥刑的缘故。

一方面,武则天不信任他们。另一方面,文武大臣们对武则天也有戒心,当年的酷吏和诏狱,他们必然是记忆犹新的。过去使用滥刑使武则天失掉了臣僚们对自己的信任,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成为武则天太亲信的人,反倒有不少人越来越对唐室怀旧,即所谓“唐之名臣,难忘中兴之计”。

当年的武则天起来反对现在的武则天了。她终究自食其果。那把曾经得心应手的刑刀在武则天的君臣关系中刻下一道深深的裂痕,表面上融洽的君臣关系下面埋伏着危机,武则天晚年实际上是非常孤立的。内心的空虚寂寞使她不得不在政治上求助于二张,而这样做又使她更加孤立,最后二张为她招来了政变。

(摘自《女主临朝:武则天的权力之路》,岳麓书社2024年5月出版)

在所有那些以疯癫著称的艺术家家中,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见左图,在妻子加拉额头上作画)或许是最疯狂的一个。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龙须胡,到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方式,再到横跨绘画、摄影、电影、蚀刻、雕塑、戏剧、文学、时尚、美食、珠宝等极广泛领域的旺盛艺术创造力,达利堪称20世纪的头号艺术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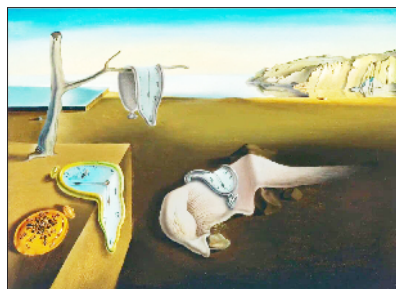
在所有浮华的标签背后,真正影响达利一生创作的乃是其对现代心理学、物理学乃至生命科学的高度痴迷,对时间、物质、能量等科学与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对科学与艺术之间相互交融的不懈探索,对不同艺术领域之间脑洞大开的跨界实验。

梦境与潜意识

1923年,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代表作《梦的解析》西班牙语版发行。

当时正在马德里求学的19岁青年达利在书中遇到了这位对他前半生影响至深的大师。在达利看来,这是一本足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巨著,他在私人藏本的页边空白处写满了笔记。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他与巴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频繁交往,以及对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和梦境理论的参悟,达利高度鲜明而强烈的绘画风格逐渐形成。



达利的科学情结

·吴靖·

对量子力学的关照

尽管前半生痴迷于弗洛伊德,达利始终对物理学和生命科学怀着高度的热情。据说他长期订阅《科学美国人》杂志,临终时床头还放着霍金、薛定谔等人的科普著作。这份兴趣随着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及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分子模型的提出再度疯狂地燃烧起来。后来,达利在《反物质宣言》(1958)一文中写道:

当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时,我希望创造内心世界的肖像,奇妙世界的肖像,我的上帝弗洛伊德的肖像……现在,外部的物理世界超越了心理世界。我的上帝如今是海森堡博士(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

在新导师海森堡量子力学观念的指引下,达利中后期的作品中出现了断裂、破碎、非连续、漂浮等形象。他认为,质子、反质子、光子、 π 介子、中子,这一切基本粒子之所以有

其奇妙、超美感的能量,全来自于它们的非连续性。

在这一迷人观念的指引下,达利与著名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联手创作了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原子的达利》(见中图,1948),显然这是对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观照和呼应。在这幅脑洞大开的作品画面中,画架用细铁丝悬挂起来,椅子由其夫人举起,三个助手按口令抛出三只猫,另一助手负责泼水,达利同时跳起来,这个镜头前后反复拍摄了28次,持续了大约六个小时,终于获得了一次成功。在这幅来之不易的画面中,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漂浮在空中,如同在一颗原子之中。

透过这幅作品,达利想要告诉世人,在一切看似稳定的表象之下,微观世界的纷乱和无序才是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

DNA的发现为他提供了“上帝存在”的证据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醉心

于科学前沿动态的达利又对蕴藏着物质遗传密码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着了迷,他甚至经常出现在各类生物学会会议上,并与DNA的发现者之一、著名科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会过面。在他看来,DNA的发现为他提供了“上帝存在”的证据,而他的这个“上帝”乃是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心目中的“上帝”——自然。

这一时期,达利创作了一系列向DNA致敬的作品,其中尤以《记忆持久性的瓦解》(1954)最具代表性。23年后,达利亲手对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记忆的永恒》(见右图)完成了解构。在那个由量子学和DNA所主导的新时代,原作中的景观被水淹没了一半。新科学向世人表明,染色体所包含的遗传物质DNA的断裂可能是新记忆的一大源头,这正是这幅颠覆性画作的题中之义。

对四维时空的探索

对于将量子力学的思想

融入艺术创作,达利的尝试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这在他晚年对四维时空的探索中达于高潮,同样创作于1954年的《受难》集中展现了这一点。

在这幅诡异的作品中,耶稣怪异地盘旋在以达利的妻子加拉为原型塑造的人物的上空,摆出已经被艺术家们画了数百年的经典姿势。但是,在这幅以“受难”为主题的画中竟然没有钉子,十字架也不是木制的。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能看到的画面甚至不在一个维度中。在此,达利特意将十字架换成一个抽象的超立方体,这种具体与抽象的组合构成了一种超然空灵的神秘感。达利运用几何图形绘画的能力丝毫不逊于著名的荷兰版画大师埃舍尔。就这样,达利前无古人地将耶稣的经典形象与只存在于数学理论中的图形结合起来,从而将几何学带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

2012年,达利生前好友、数学家托马斯·班科夫在达利博物馆举行讲座,解释了达利如何尝试使用“源于并超越三维空间的事物……就是同时使用两种透视——两个叠加的十字架”。

颇为巧合的是,《受难》完稿的1954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在日内瓦成立。达利对于原子结构的痴迷,或许起始于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疑问:摆弄这种神秘事物会将我们引向生存还是灭亡? (摘自5月11日澎湃新闻)